



率性丛书 | 第二辑

《中庸》开篇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率性”意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朱子语）。

率性丛书中的“率性”二字即采自这里。

性情之不同，各如其面，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

这套丛书，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

书太多了

吕叔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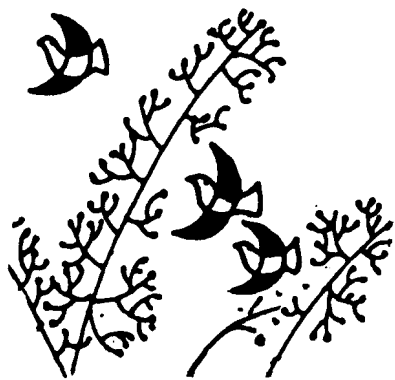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中心



率性丛书 | 第二辑

书太多了

吕叔湘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太多了/吕叔湘著;刘广,王潇琳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8

(大师率性丛书)

ISBN 978-7-5473-0032-9

I. 书… II. ①吕…②刘…③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205号

书太多了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字 数: 202千字

印 张: 9.625 插页3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100

ISBN 978-7-5473-0032-9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节制的美德(代序言)

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制定时,参与者不仅有众多的法学专家,还有几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吕叔湘与胡绳、叶圣陶一起为宪法修正文辞,在无形中充当了“立法者”的角色。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吕叔湘有资格充当这种“立法者”的角色吗?

晚年吕叔湘在给外孙吕大年的信中说:“对于你当前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只要守住两句话:一句是‘要尽其在我’,另一句是‘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要尽其在我’这是当然之理,但很容易流于‘我非要!’这就要吃苦头了。所以不光是要能‘拿得起’,还要能‘放得下’。‘我非要’就是《论语》所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里边的‘必’和‘固’,也就是佛教所谓‘执着’,是修行的大忌。什么事情都应该恰到好处(做菜也要讲究火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moderation,跟 moderation 相反的是 excess,凡是‘过火’的东西都是不祥之物,是要触动 Zeus,给予惩罚的(这是希腊悲剧的主导思想)。这个道理不但是你目前需要它,一辈子都需要它。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坏在‘我非要’上。”这大约是吕叔

湘先生一生的经验之谈——“我为”而非“为我”，这就需要中和冲淡的精神。moderation也就是德尔菲的神谕：毋过度。东方的美德、佛陀的教诲与希腊的神谕在这个中国人的身上的结合是如此的和谐与自然。细读吕文，在“毋过度”的日神精神光环下，我们会发现一种昂扬多彩的酒神精神；在单调平缓的叙述中，蕴含着惊心动魄的波澜壮丽。这种节制而不呆板的特点就是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并且贯穿于吕叔湘各时期的著作中，从一个侧面展现着他多姿多彩的思想谱系。有了这种节制的精神，吕叔湘就具备了文辞之外的“立法者”的资格，而我们编选的这本小书，正从各个侧面体现了他的这种精神。

我们把选辑的这本小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文明与野蛮”，收录的是吕叔湘的杂文。虽年事已高，事务繁杂，吕叔湘依然读书笔耕不辍，并用陆放翁诗自勉：“从今倘未死，一日亦当勤。”“未晚斋”大约也是取“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之意。他自己说：“有些事情，像阿拉伯文或者迪斯科舞什么的，学起来太晚了，至于读点有益的书，做点有益的事情，应该没有太晚的时候吧，于是题为未晚斋。”吕先生写文章特喜转述别人的著述，所以有人讥讽他的文章写得“不三不四”。但是选择、转引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创造吗？

晚年，他在给外孙的信中说：“1937年中秋节的时候中日战争已经蔓延到上海，我们在国外过节很不是滋味。我那时身边有一本我译的《文明与野蛮》，拿出来送给向达，在扉页上题了一首七绝：‘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第三句指向达正在不列颠博

物馆检阅敦煌卷子，我正在研究《红楼梦》语法，觉得这些事情对抗战毫无用处。”欧风美雨的沐浴，仍旧洗不去心中古远的黍离之叹、鸡鸣之声，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或许言辞之上的城邦还是比言辞本身更为重要。

因了上面的揣测，我们把吕叔湘的杂文放在了文集的前面，把其中对文明社会思考的文章放在了最前面。语言学家探讨人类学、社会学问题，在现代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里，这总有些“思出其位”的嫌疑。但我们要知道，吕叔湘去牛津学的正是人类学，况且他们那一代人既接受了“子曰诗云”的熏陶、“民主科学”的劝化，又逢家国巨变和各种政治运动，诸如此类文明之种种成就，都不可能不使一个有理智的人重新审思我们和我们以前时代“文明之真正历史”。

“人类的进步可以比作一个老大的生徒，大半生消磨在幼稚园里面，然后雷奔电掣似的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文明与野蛮》）时光荏苒，半个世纪后，《文明与野蛮》这本书又拿来重印，“雷奔电掣似的”进入“大学”的人类是不是比“幼稚园”时更加高妙了呢？吕叔湘认为自己当年对“文化宝贵遗产里掺杂了许多渣滓”这一点强调得还不够，五十年的风吹雨打使得吕先生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含义有了更深的切身体会与思考，文明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火器射禽兽也射人类。君主立法以治国，也制刑以残民。生物学者研究遗传，也妄想修补人类。结果是两相抵消。”更为要命的是，我们应该明了在光明日昌的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掩盖于光亮之下的为光明所遮盖的黑暗，而这又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以“真理”“文明”之名而行丑恶野蛮之

行径者，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有一部分人真是坚决保卫他所认识的‘真理’，令人叹息的正是这个”。只要联系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体会吕叔湘这一声叹息之深沉。他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赫胥黎的话说：“社会祸害莫过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损害良知良能的习惯莫过于盲目的、毫不迟疑的服从无限制的权威。饥寒淫乱是祸害，但是比这些更大的祸害是让全体人民的智能受制于有组织的狂热；是眼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一个立志传布他的狂热的君主；是坐视本来应该对自己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们堕落为无知的工具，听从一个主子的任意使唤。”正是这种无节制的宗教狂热和无限制的权威坚决保卫他们所认识的“真理”的行为给文明的画卷涂抹了无数血迹与泪痕，但这未必就是所谓文明进步不可避免代价，如果说是代价，那它也未免太过沉重了。

要医治这种文明的“并发症”，就必须对造神运动和宗教狂热这类文明常态的病理特征和危害有个清醒的认识。在《鬻理斯论塔布及其他》中，吕叔湘认为，无论是西方至高无上的教会或者“救世军”还是东方至高无上的礼教，都是用“塔布”来控制、束缚人的思想的。“塔布”就是禁忌，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塔布”，并将其印在每个人心上，流在每个人的血管，使之成为近乎本能的意识，以维系社会的运转。东西方的各类“教主”们正是靠了“塔布”的力量才发号施令、为所欲为。要取消外在的“塔布”施加于我们的克制，就必然要求我们创造一种内在的、自加的“塔布”构成的新的克制来代替，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克制。“这意味着创造新

的自觉自愿的塔布，一种缓慢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负责，这不仅本身是一种继续不断的自我克制，而且有跟以同样的真诚从事于相同的任务的别人互相冲突的危险。因为虽然我们还是沿用‘道德’这个名称，可是既然把对道德的认识交在个人的手里，就不会对所有的人都完完全全相同。当然，由于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所有的人的道德观必然脱胎于一个共同的模式；但是既然涉及个人的认识，那就比从外面加在我们身上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塔布有所不同，要求更多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忍耐。”要消解各种宗教徒式的狂热和“教主”们的独断，就非需要一种克制做解毒剂不可。但这种克制是不能在杀死病毒的同时损害身体其他细胞的，这是基于互相理解和忍耐的克制，是一种允许多样性存在的节制。没有多样性，节制只能演变为独裁；没有节制，繁复多彩的文明只能制造出“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而这些正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弊病。就这样，吕叔湘在对前人文辞的引述中巧妙给出了医治痼疾的灵丹妙药——“和而不同”的礼乐精神。

文明瑕瑜互见、繁复多样，作为文明载体之一的书籍报章自然也是如此。吕叔湘对于书籍的态度绝对是别具一格的。一个勤奋的学者多有买书藏书的癖好，吕叔湘也不例外。但他的买书藏书却有些特别，藏书并不是很多，且多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外文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今不古，有西无中”。别人嫌书少，他却怨书太多了；别人努力买书、藏书，他却要毁书、卖书。千百年来出版了无数的书，现在每年还在大量增加，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浩如烟海的书籍呢？这对

于知识爆炸时代的我们更是一个难题。有人干脆不读，有人厚此薄彼，有人随大溜，有人来者不拒，但吕叔湘的态度很老实：能读多少读多少，想读多少读多少，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也不要跟书过不去。就文学而言，文学有两大用处：主要的用处是引起并满足人们对生活更敏锐的感受；较肤浅的用处是在社交场所提供谈助。所以，不要抱着一种竞赛的心理去读书，因为虽然竞争是做生意的命根子，却也是破坏社交及其艺术的毒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的繁荣，有赖于共享而不是垄断。

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多样性，但读书却更需要节制，未必“开卷有益”、“多多益善”、“能读多少读多少，想读多少读多少”，也不是随意乱读。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生命太短暂了，以致我们只能与最伟大的书在一起，聆听那些最伟大的灵魂的絮语。没有审慎的态度和节制的精神，我们怎么保证不被信息的汪洋瞬间淹没呢？以从容不迫之心态阅读最伟大心灵的最伟大的书籍，也许正是我们时代的求学者最需要的。

第二部分我们定名为“学文与咬文”。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都有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反映时代的风貌又反作用于时代。正是由于语言具有这样一种多样性和流动性，反而使得很多人对于时时刻刻都在使用着的语言和文字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这就像吕叔湘在《语文常谈》的序里所言：“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字也是这样。”有

人认为文章与语言是平行的，谁也不依赖谁；还有人说“中国话”就是没有“文法”，历代文学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文法”却写出好文章。

对于上述诸种观点，作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仍然坚持以审慎节制的精神对待语言、思维与社会历史交织纠葛互动的流变，在保持语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以规范的语法格式和标准构筑约束语言思维长河的堤岸，引导它安步而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了这种克制与约束，语言的河流很快就会溃陷为芜草丛生的泥淖水寮。

作为饮誉中外的语言学专家，吕叔湘可谓著作等身，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些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饶有情趣的文章。这部分内容比较丰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语文常谈，选录作者几篇关于语言文字的总括性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窥豹一斑，了解吕叔湘主要的学术观念。第二个层次是语言与社会，选录与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章，其中不乏生动幽默的妙品。第三个层次是咬文嚼字，辑取吕叔湘规范语法、斟酌字词的几篇短文。

近现代中国的语言学受西方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分歧和争论，其中一些至今还存在。最主要的争讼就是拼音字与汉字之争和文言与白话之争。作为语言工作者，吕叔湘自然也加入论战之中。他认为这与当时国家文盲众多，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大背景有关，国家要复兴，人民要脱盲，非常需要一种快速简易的认知和掌握途径，拼音字和白话文实在是不错的选择。

语言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在构建影响着社会生活，在吕

叔湘看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多人看来,语言学是门干瘪乏味的科学,吕叔湘信手从众多中外典籍掌故中采撷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以通俗有趣的方式讲解丰富多彩的语言学知识,真可谓寓教于乐。从文章的题目中我们就可以揣摩出他的良苦用心:《笑话里的语言学》、《从改诗的笑话说起》、《张恨水的幽默》及《生男与生女》等。《笑话里的语言学》从古代文史资料中选取了大量使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按照谐声、拆字、歧义、歇后、忌讳等分为几个类别,在让读者开心一笑的同时,严密扼要、有条不紊地详细说明这些笑话的语言学依据,最后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指出共同的知识背景是这些笑话引人发笑的前提。文章构思巧妙、结构严密,让读者感受到汉语的生动活泼和语言学的意趣盎然,可以作为我们谋篇作文的范例学习。此外,吕叔湘还翻阅大量文献,对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熟语和器物的由来推本溯源,如《莫须有》、《绿帽子的起源和产地》及《馒头和包子》,具有很高的资料性和可读性,使我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了解到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教师、语言学家和编辑,吕叔湘对于学文、作文与“咬文”之道是很有心得的。他在《学文杂感》中说:“主要是看好文章。不要囫囵吞枣,要细细咀嚼,自然会嚼出道理来。”读好文章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一种节制,细细咀嚼、慢慢品味则是耐心上的克制,学文没有了这种“单纯执着”,必然会陷入语言文字的云里雾中寻不出方向。他还提出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晚改不如早改。这里面是没有什么技

巧和捷径的，只能多流汗、下苦功夫，否则“作者不流汗就要读者流汗”。文章的修改编辑本身就是一种重新选择、重新阅读、重新写作，所以对于文章的“第二作者”编辑，吕叔湘也有很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大下功夫，打好基本功，具备较高的学养，以细致谨慎的态度，多动脑筋、善于质疑，以至于字字落实，咬文嚼字。作为语言学家，咬文嚼字是吕叔湘先生的本行。学文是咬文的前提，学文之后，方能咬文。国有国法，文有文法，引导作者按照语言文字与修辞的规范展现文学与生活的五彩缤纷可以说是语言学家的一大使命。一直以来就有人轻视语言的语法修辞和文字范式，认为是壮不为的雕虫小技，以致现在大街小巷、电视报刊错字连篇、病句盈目。文学本是“经国之大业”，运用不当，一字之差就可能误国害命；从小处说也可能混淆题旨，贻笑大方。对于许多人不屑一顾的文辞句法，吕叔湘先生却发扬“能贱”的精神，遇到报刊书信和翻译中的语句讹误、格式错误、假大空话非要一一列举出来，把糊涂账算清楚。至于他做的有什么价值，只要我们读读他的几篇“叫汁儿”的文章就知道了。

第三部分是“往事与故人”。吕叔湘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在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自然会结识不少名人，但他的性格节制内向，自言从小胆小怕事，不爱与人交往，所以回忆故旧的文章自然就少，大多是八十岁以后所作。即使这一鳞半爪的文章他也惜墨如金，感觉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在这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中，也大多是铺叙式的文字，如记家常，绝少热烈的情绪显露。他是如此恪守太阳神“毋过度”的神谕，以至于吝啬到“忘情”的地步。但细读这些回忆，我们

却会发现这并非圣人的“忘情”，更不是最下的“不及情”，而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不过这种情感被含蓄克制的美德所掩饰，非得反复咀嚼，否则绝不能从平静的海面体会到洋底的汹涌澎湃。在《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一文结尾，他说：“我于1950年2月到清华，住在北院，佩弦先生旧居近在咫尺，夫人和子女还住在里面，两家常有往来，佩弦先生所用书桌书柜都保存原状，见了不胜人琴之感。”一句“不胜人琴之感”看似轻巧，但其中所包含的非凡的克制和深沉的情致，却足以让人揣摩良久。

甚至对自己的往事，吕叔湘也没有用专门的笔墨描述，如果不是有他给外孙吕大年的几封信，我们只能去“道听途说”了。本来吕叔湘不愿意写回忆录，这倒不是出于老年人的恐惧，而是因为自己“这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知道的事情，何必浪费纸张笔墨”。1985年，他的外孙吕大年到美国留学，在给吕叔湘的信中谈到，“我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把自己认为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强加在客观环境上”。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当今的青年乃至成年人身上尤为普遍，这种自我的无限膨胀无疑引起了吕叔湘的忧虑，他在回信中谈到前文所引的一段话：做人做事既要保持自我的个性，又要自我克制，毋执毋我，努力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老马识途，长寿老人的经验是家族的一种财富，“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讲给家里的晚辈听，也还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吕叔湘的这几封信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以己为鉴对后代的谆谆教诲。他从自己的家世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文笔依旧是波澜不惊，在轻

缓的叙述中阐发着一位老者的人生哲学。

杂文也好，咬嚼文字也好，回忆故人和往事也好，这些文章都贯穿着不变的清淡风格，节制，却也有张有弛。毋庸置疑，这种宽容节制的人生哲学对于现在的人们不失为一味清凉剂。

而我们把这本小书取名为“书太多了”，不觉间暗合了这种让人心怡的“节制”精神。

刘 广

目 录

节制的美德(代序言) / 1

文明与野蛮

.....

《文明与野蛮》译者序 / 3

《文明与野蛮》重印后记 / 7

赫胥黎和救世军 / 11

霍理斯论塔布及其他 / 24

《未晚斋杂览》小引 / 35

书太多了 / 37

买书·卖书·搬书 / 45

老想着有别人 / 51

从“国骂”说开去 / 53

谈谈学理学文的问题 / 55

谈谈大学语文课的重要性和教学的艰巨性

——在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三届年会上的讲话 / 57

学文与咬文

.....
《语文常谈》序 / 65

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

——汉字改革一夕谈 / 67

文言和白话 / 104

从文言到白话 / 124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 / 129

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 132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 / 134

笑话里的语言学 / 144

从改诗的笑话说起 / 154

张恨水的幽默 / 156

诗句的次序 / 157

生男与生女 / 158

南北朝人名与佛教 / 160

苏东坡和“公在乾侯” / 171

莫须有 / 175

一不作,二不休 / 179

绿帽子的来源和产地 / 182

馒头和包子 / 185

咬文嚼字 / 187

学文杂感 / 191

- 编辑的修养 / 193
- 由“rose”译为“玫瑰”引起的感想 / 202
- 剪不断,理还乱
——汉字汉文里的糊涂账 / 205
- 书刊上的错字 / 210
- 单名以及有关写信的用语 / 212
- 简称的滥用 / 215
- 论“基本属实” / 217
- 空话 / 219

往事与故人

-
- 我的简单回忆
——致外孙吕大年 / 223
- 读书忆旧 / 248
- 北京图书馆忆旧 / 252
- 记寓居牛津二三事 / 255
- 陕州阻雨日记 / 258
- 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 / 263
- 纪念浦江清先生 / 266
- 回忆小缘先生 / 272
- 怀念凤子大哥 / 275
- 悼念王力教授 / 278
- 怀念圣陶先生 / 282